

從東方文化看日本的前途

陳水逢

文化的內涵是什麼？這是一個不甚容易解答的問題，文化的接觸原是人類進步的標識，胡適先生說過：「一個民族的文化，可說是他們適應環境勝利的總和。」魏勒教授 (Prof. Willey) 說過：「文化是複雜的總體，包括物質、智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人類在社會所得的一切能力與習慣。」亦即文化係根據源於歷史及環境的產物，除物質方面以外，尚包括有精神作用，是故所謂文化所具有的特性，它不僅具有傳播性和同化力，同時又可由模仿學習取得，所以文化固為精神活動的產物，但人類的活動却時常受環境的影響。

東方文化乃溯源於中國及印度，這兩個文化代表着東方文化；尤其中國是亞洲的中心力量，是東方文化的主流。懷德海氏認為「中國文化是世界上最雄厚的主流，對全世界的文明貢獻，可說是首屈一指。」而日本上古及中古的歷史文化因受到中國文化的薰陶影響，而使日本由草莽野蠻狀態走向統一集權的國家，雖降及近代經明治維新，因融滙吸收西歐文明，使日本步上近代化國家之途，而在各種物質文明方面遠勝於中國，但在精神文化方面，日本迄今仍受中國傳統文化的薰染。日本文化為東方文化的支流，與中國印度文化有著共同面，且受莫大影響。誠如曾任駐日大使的美國學者賴世和 (E. D. Reischauer) 氏所說：「正如北歐諸國文化為地中海文化的支脈一樣，日本文化是中國文化的支流」。從歷史上觀察可知日本文化深受中國文化影響，日本學者例如木宮泰彥氏岡田正之博士及內藤虎次郎博士等諸學者亦皆承認此一事實。而約翰·芬尼摩 (John Finemore) 在其所著「日本小史」(Japan) 一書中亦謂：「中國文化對於日本影響甚大，即使說日本所以有名震全球的資格，全係受了中國的影響所致，亦不為過。」從上述幾位學者專家的言論來看，日本文化是東方文化的一個支流，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這是毫無疑問的事實。

東方文化，其歷史悠久，實力雄渾，其本質乃精神重於物質，以士農

為中心，重倫理道德，是內傾的文化，綜合性的文化，愛好自然，崇尚無為，注重修身與齊家，以「誠」修己，以「仁」待人，以「慎」處事。具體而言：在對物的看法上，東方文化絕不把東西孤立起來作為研究之對象，而對任何東西，都注重它和整個的相互關係，亦即具有協和性；在實際關係上，以人為中心，重感情，重視家庭組織，穩固倫理關係，重孝道、重恕道，具有佛教之慈悲，重教化，嚴以律己，薄以責人；就處事而言，守「中庸」之道，不走極端，重理性，求善行，富理智，有遠見；就政治方面而言，忠君愛國、講王道，即和平的，懷柔的，同化的。東方文化造就泱泱大國之風，有世界理想。總之，東方文化乃是以中國文化的儒家思想為主軸，輔之以印度文化的佛教的慈悲所形成的一種可大可久，至大至剛，綿延不絕的王道文化。而西方文化是霸道文化。講王道主張仁義道德，講霸道則主張功利強權，講仁義道德是由正義公理來感化人，講功利強權，是用槍炮武力來壓迫人，兩者有顯然的不同。總之，文化的基礎，是築在「人」上面，沒有人，即沒有文化，所有物與心的文化，都是為了人，從「人」出發。這文化的發展，是純潔的，是真實的，不是虛假的，是正的，不是錯的，這就是王道與霸道之辨，也就是東西文化的分野。

關於日本的歷史，儘管戰前日本史學家偽造史實，誇稱日本開國歷史超過二千六百年，但嚴格來說，日本歷史不過是從二千年前左右才開始的，在這二千年的歷史演進過程中，自世界史的觀點來看，日本歷史文化具有其特徵，日本歷史文化有一種連綿性，吸收攝取外國文化功能，以及同化性，中和性。由於這些特性，使日本在歷史演進過程中，其國土、民族、統治者的所謂國家構成的要素，從開國以來到今天，連綿一貫而無任何顯著的變更或繼絕；使日本因攝取外國文化，受其影響，而不致處於低開發狀態，並以長補短，去腐更新，充實發展自己的歷史文化；同時也發揮了「和魂漢才」的功能，以日本的精神，盡量吸收外來的文化，將中國文

化、印度文化、西洋文化，以日本精神分別予以「日本化」而吸收之，以與日本古有文化渾然融合，而形成新的日本文化。以上這些特點，在日本的歷史上，可以舉出許多事例來，其中最為顯著而影響最為深遠的，莫過於師法中國唐代文化的大化革新，與師法西洋文化的明治維新。無可否認的，日本在吸收外來文化，在適應時代的思潮或情勢上，其成就之多，非其他國家所可比擬，徵諸大化革新與明治維新的內容實質，即可一目了然。

衆所周知，日本一八六八年的明治維新是師法西洋文化的一個大變革，是日本接受了西洋的哲學、政治制度及科學技術，為日本步上現代化並躍登世界國際社會的發端。考其原動力則為「尊王攘夷」思想，此一變革之所以成功，固由於外侮的刺激，然國民普遍具有忠君愛國之思想，實為不可忽視之因素，而此一思想深受朱子學（宋儒朱熹）的影響，亦係受了春秋學的尊王論的影響。其基本精神則為反對侵略（抵禦外侮），而非侵略他人。但在事實上，由於明治政府的「殖產興業」、「富國強兵」等政策的逐步實施，日本在短短三、四十年之間完成了輕重工業建設的兩次產業革命。更由於日本國民具有「民族的統一思想、統一信仰、統一力量」，因而使國力潛滋暗長，明治維新的成功，造成了日本悲劇的根源；在維新三十年後，一戰勝滿清，四十年後再戰勝俄國，一躍而躋身世界強國之林，並使日本軍閥財閥誤認戰爭是國力增進的發財機會，而提出所謂「八紘一宇」、「天下一家」，乃至於日本式的「王道主義」，以做為征服亞洲統治世界迷夢的口號。對此，當年 國父孫中山先生曾提倡「大亞洲主義」並警告日本說：「你們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歐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亞洲王道文化的本質，從今以後，對於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東方文化的干城，就在你們日本國民去詳審慎擇。」中山先生期望中日兩國成為亞洲民族運動的原動力，並殷切以王道文化勉勵日本，可謂語重心長， 總統蔣公也曾於民國二十三年，中日關係日趨緊張之際，口授徐道隣先生發表「敵乎！友乎！」，文中指出：「中日兩國在歷史上，地理上，民族關係上，無論那一方面說起來，其關係應如唇齒與輔車的相依，合則兩利，敵則兩敗。」又說：「須知日本戰勝非中國之福，日本戰敗以至於滅亡，也非中國及東亞之福」。 國父及 總統勸告日本軍閥應澈底捨棄其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的迷夢，終在我中華民族八

年血戰犧牲的代價下始予以毀滅，而日本本身也因發動侵略戰爭而在物質與精神上遭受嚴重損害，尤其是精神上，戰敗的結果，引起日本國民精神的虛脫狀態，從前萬世一系神聖不可侵犯的天皇，由「活神」（現人神）的地位降為國家統一象徵的「凡人」。自詡為萬國無比的國體，成為舉世唾棄的糟粕。軍國主義的思想，成為禁物，武士道的精神，化為烟雲。歷代戰爭所積聚的國力，幾乎消毀無餘，七、八十年來日本國民的父祖輩胼手胝足，以血汗所築成的結晶，化歸烏有。日本國民以往的一切「誇耀」，一切「榮譽」悉掃地無餘，歷史上從未被人踏入的國土，不得不讓戰勝者所佔領。日本之所以遭受如此命運，軍閥固應負大部分責任，但日本國民亦不能因以卸責，而這也是對東方文化一次大的激盪。

對於侵略者的日本，我們並沒有採取報復主義。抗戰勝利後的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 總統發表「告全國軍民及全世界人士書」，提出基督實訓上的「待人如己」、「要愛敵人」，與我中華民族傳統至高至貴的德性「不念舊惡」、「與人為善」，表現「以德報怨」的精神，這是東方文化的最高表現，也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無與倫比，至高無上的表現。對於這個表現，中國人是值得驕傲的，而日本人則應在感激之餘，切身反省，應對東方文化的崇高性益增信心，並予以弘揚，使全世界對東方文化的真諦重加認識，庶幾對擾亂不安定的世界人類危機有所裨益。

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慘敗之教訓的日本，由於新憲法及一連串民主法令的公布，使日本漸趨民主化，新憲法規定放棄戰爭，使日本真正成為愛好和平的國家，更且，一九五〇年韓戰的爆發，為日本帶來復興的新機運，爾後舊金山對日和平條約與美日安全保障條約的締結，使日本再度成為國際上的獨立主權國，在美國核子傘的護衛、援助下，日本的經濟一天天加速成長，其國民所得也日益提高。由於經濟形態的急劇轉變，在二十多年中，使農業人口從百分之四十，降到一九七〇年的百分之十六點二。工業化以及都市的迅速發展，更使日本人民的生活發生巨大變化，社會結構也隨之而變，中產階級擴增，尤其重要的，日本人的想法，道德標準與社會生活等各方面却發生或大或小的變化。在政治方面，戰後的日本最大變化，莫如新憲法中加入「放棄戰爭」的條款，以及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的建

立，由於放棄戰爭的規定，因此日本在防衛上，也因美國的世界政策的改變，而逐步邁向再軍備的途徑，其間，與美國簽訂MSA四協定，成立自衛隊，又以一連串的防衛力整備計劃以及美日安全保障條約的改定，使日本在發展經濟上、防衛力的增強上，有顯著的成果。進入一九七〇年代以來，日本為配合國力的發展以及準備接管美國所「歸還」的琉球，在美日安全保障條約繼續延長以後，其防衛力量則有更大幅度的增強。尤其美國亞洲政策的改變，給予日本一個很大的刺激，這是日本在亞洲復出，在世界再登場的一個轉捩點。以前日本只能挾持其雄厚的經濟力量，活躍於世界舞台，但今日的日本則不以此自滿，她希冀能由「經濟大國」一變而為「政治大國」的慾望，則日益顯著化。今天日本的國勢，比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就經濟力而言，有過之而無不及；就軍事力而言，以兵力數字觀，則今不如昔，以裝備武器之火力觀，則今倍於昔，今日日本國力之鼎盛可謂空前，以如此優越之條件，日本若欲對世界有所貢獻，那是輕而易舉的事，但從一般可待瞭解的實情看來，日本致力於世界繁榮與和平的努力是不够的。

今天日本以一個「經濟大國」活躍在國際社會上，曩昔，日本人曾以建立「大東亞共榮圈」作幌子，從事侵略，導致徹底失敗，而日本人在戰時以武力作後盾所沒有達成的目的，而今天却藉和平的經濟手段完全達到，這是另外一種型式的「戰爭」，日本可以說已經有了相當值得驕傲的成就，因而在志得意滿之餘，又儼然以亞洲的領袖自居。事實上，日本是否足以成為亞洲領袖的資格，這並不能完全以經濟力量來決定的，一般人認為日本過去在亞洲加諸各國家的暴行，令人記憶猶新，日本近十幾年來豐富的結果，態度驕橫，與亞洲各國之間，除經濟關係較為密切以外，並無太深厚之友誼，誠如武者小路公秀教授所云：「日本人與其他亞洲人之間的心理距離比日本人和西方民族之間的距離還大。」武者小路教授在談及日本與亞洲其他地區之間日見擴大的經濟發展差距時曾說：「這也許不會阻止彼此之間的經濟合作，因為這項合作有益為其動機，可是日本與其他亞洲國家間的文化與政治合作，便將產生心理上的障礙。」由此可知，日本對亞洲地區，在致力於文化方面的努力是不够的，棟才嚴教授說：

「我們（日本）在經濟上也許是亞洲的領導者，但在文化方面，顯然有極深的隔閡，這方面我們缺少遠見。」美國魏斯里安大學歷史系教授歐爾遜博士（Dr. Lawrence Olson）在其於一九七〇年八月間出版的「日本在戰後亞洲的地位」（Japan in Postwar Asia）一書中，指出日本知識份子對於西方瞭解比對亞洲要多，對於這種現象，歐爾遜博士說明這是日本人輕視亞洲人所造成的。這樣的觀念，對於做為東方文化一個支流的日本是有害無益的。到底經濟力量是外在的、現實的；而文化的影響則是內在的、主導的。關於這一點，深盼日本人能深切瞭解。

在這裡，我們更要指出，今天日本的社會結構，已是今非昔比，價值觀念的轉變，使得日本人變得自私而現實；西方社會的一些陋習，在日本的社會流行着；年輕一代的「變」與「亂」是出了名的。因此，自由與維持法紀之間的衝突，在今天的日本社會裡，被認為是一項嚴重的問題。這是今日日本文化面臨考驗的時候。一般人認為，從西方文化而言，當前有許多大國雖然表面富強，但其四維不張，人民多離心離德，實有類似先聖孔子所云：「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的狀況，這種西方社會當前普遍存在的「新現代心理」是對西方文化的一種挑戰與考驗，那是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脫節所發生的心理狀態。今天的日本社會很明顯地也有這種現象存在，這是值得深思檢討的。西方文化到了二十世紀後半葉之初，已呈現出相當的危機，這些危機必須以東方文化的倫理道德迅速消弭，始可奏效。我們樂於看見日本社會能浸溶在醇厚、樸實優美的東方文化裡。

戰後二十六、七年來，日本在國際社會中，一向與美國保持密切合作，說得確切一點，日本的外交政策，戰後始終是跟着美國走的，這種態勢到了近一兩年來，日本隨着國力的滋長，在國防及外交政策上，作了某種程度的調整，提出了所謂「自主防衛」、「自主外交」的口號，表明今後將循自己國家的意志處理防衛及外交的事務，減低了以往對美國依賴的程度。隨着美國的亞洲政策的轉變，特別是對中共的態度轉變，更使得日本對於這一個他認為久懸未決的問題，是應該謀求解決的時候了。因此，自今年七月初，田中角榮氏組閣以來，對於中共問題態度的積極，出乎意料之快速。近數月來，日本對中共的所謂「國交正常化」，正在積極地進

行，而且已達愈演愈烈，愈發不可收拾的地步。日本這一作法，自認為在過去二十六、七年，對我中華民國的支持，已盡了最大力量，對我已算足以報恩了。孰不知，一部分日本為政者短視近利；置國際道義於不顧，忘恩負義，妄言「國交正常化」，企圖廢除中日和平條約，與我斷絕外交關係，陷中共於井而不自知，實在是葬送國家前途的作法。我們對於日本與中共的勾搭，憤慨無已。回顧日本在近一百年來，一而再，再而三地違背東方文化傳統精神的種種作法，實在令人痛心。當知歷史能鑒往知來，因為歷史上的因果報應，是真實而必然的，現在之果，皆由於過去之因，而由現在之因，可知未來之果，此乃東西各民族之常識，是科學的真理，尤其是歷史的真理，害人者終必自食其果，日本有識人士，能不戒慎憂懼乎？

今日在亞洲能够抵抗共產主義侵略的，嚴格說來，恐怕只有中華民國、日本、韓國、菲律賓及泰國了，這些國家都是愛好自由民主和平的，在當前的國際局勢當中，各國積極合作發展猶恐不及，而一部分日本為政者居然還有工夫與中共打交道，甚至於「建交」，這真是自毀長城的作法。對此，我們憤怒，我們也感懼。我們認為日本這種自私，背信的行徑，是對東方文化傳統精神的挑戰，同時也將使日本導致再一次的投降，歷史是會重覆的，讓我們拭目以待！

日本前首相岸信介先生曾說：「今天日本的新國家主義，帶有濃厚的戰後風尚之私生活中心主義，或安適的經濟主義等色彩，對國家獨立的意義，則毫無理解和認識。」從這段話裡可以窺見日本國民戰前與戰後的兩種型態，也可以瞭解東方文化在日本逐漸褪色，這是可驚的現象。的確，在不到二十年的歲月當中，日本從戰敗饑餓中站起來，以一個資源不足的島國，靠巨大的產業力量而活躍於世界舞臺上，這份成就，是令人讚嘆的。但是今天日本固然已成為世界第三工業國家，可是她的工業基礎，與原料資源之大部分要仰賴海外的輸入，與原料資源之大部分可求諸國內的美國蘇俄不同，其體質甚為脆弱，其貿易之性格為進口原料出口工業產品的「加工出品貿易型」，關此，印度故總理尼赫魯曾下警語，指出日本不够在世界上保全勢力的條件，最後也會像英國那樣專靠海外貿易繁榮的國家，其影響力終究要衰弱下去的，日本也難免會走向這樣的命運。因此日本對

於這樣的「危機」能無動於衷乎？日本應善用其經濟力量，輔之以王道的東方文化，使世界與之有經濟交往的國家，都能體會出東方文化的渾厚，優點，那豈不是一舉兩得的事？

今天由於田中首相之不顧正義操急行事，對中共的勾搭，已幾至無可收拾的地步，倘日本執政當局未深明大義，而妄自與中共「建交」，則不久之將來，日本不僅有出現社會黨、公明黨等親中共政黨的「聯合政府」之可能，進而共產赤色政權，將必應運而生。俄會史達林曾經說過：「解放了中國大陸，已踏上了到歐洲的便道；解放了日本，便所向無敵」。毛曾澤東亦說過：「世界革命，第一次是蘇俄革命，第二次是中國革命，第三次是日本革命。日本一解放，東方就被解放，世界革命也就成功」。這些都是共產集團企圖赤化世界的毒辣計劃步驟，而日本是最重要的一站。我們願以東方文化衛道者的立場向日本提出忠告，深盼日本執政當局能溫習近百年遂行霸道文化所造成的悲劇；閱讀我們國父的「大亞洲主義」以及戰後我總統「告全國軍民及全世界人士書」，切望日本人記住此兩篇內容精湛的東方文化的精義的演說辭，而不要一意孤行，造成慘痛的後果，那就後悔莫及了。日本國會議員源田實先生對日本的前途，曾作如是的評語，他說：「如果日本沒有與亞太諸國共生死的心，日本不久會成為亞洲的孤兒，而終於踏上衰亡之道。」

曩昔，田中義一由於妄想主宰亞洲而以一紙「田中奏摺」掀起了幾乎使日本亡國的大戰爭，其為日本民族罪人，不言而喻。而今日之田中角榮氏，竟於甫登首相之初，由於未能瞭然東方文化之真髓，即進行與中共勾搭，行其所謂「國交正常化」，兩者相去半世紀，而其行徑都是違背東方文化傳統道德的，同為田中、同做日本民族罪人，是否巧合？深值玩味。田中義一在地下對於以往因一己之錯誤的判斷而造成人類史上未曾有的大浩劫，必然會慚愧疚省的。我人以亞洲友人立場深盼日本執政當局能懸崖勒馬，以挽救日本民族即將再面臨的大災浩。更望日本人發揮其傳統的「哈」、「淨」、「直」三德兼備的國民性，恪守東方文化真髓的「恕道」「仁愛」精神，痛定思痛，以維護日本國民的命脈，進而有所貢獻於世界人類的和平。